

妇女乃国家兴衰存亡的根本

——郑观应女性观辨析

◎ 陆文学

作为近代中国卓越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很多思想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极富启示意义，尤其是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深远影响的《盛世危言》一书，甚至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它的价值。郑观应的思想不仅深刻，而且全面，涉及诸多领域。从中国女性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郑观应对涉及女性的精辟论述毫无疑问使他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的思想先驱。在推进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今天，在消除男女社会不平等的尚未完成的社会任务中，郑观应的女性观依然有着理论价值。就目前的郑观应研究而言，其女性思想并没有被从总体上加以认识，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1]本文不揣浅陋，试论之。

我们知道，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郑观应在《易言》一书中就强烈批评了戕害中国女性的陋习——缠足，而在后来的《盛世危言》一书中郑观应更是直接从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阐明女性对国家、社会、民族的重要性。郑观应强国维新的改良思想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引起当时知识界强烈共鸣与欢迎。与其它的改良思想一样，郑观应的废缠足，兴女学的女性观也体现出时代的进步性，为两亿受禁锢中国妇女的解放开启了先声。郑观应的女性观同其其他改良思想一样，源自于中国士大夫传统忧国忧民的爱国意识。这种也可以说是中国士大夫民族主义传统的爱国意识表现很简单，归纳起来就是：不愿看到自己所属的群体，也就是自己的国家，衰弱不振，被异族欺凌，比如北宋之李

纲、岳飞，明之史可法、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正是基于强国救国的目的，强烈的爱国主义者郑观应才疾呼要废缠足，兴女学，成为地地道道的先知先觉者。

妇女裹足——万事隳矣

在《盛世危言》“女教”篇中，郑观应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妇女裹足，则两仪不完；两仪不完，则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而万事隳矣！”很显然，废除裹足的最后落脚点还是到了“无益于民生，实有关于世教”，有“系于天下苍生”的大问题上。这个大问题实际就是国家是否能“安内攘外”、是否能变得强盛的问题。在《易言》二十篇本的自序中，郑观应说其写作《易言》的原因是：“庚申之变（指1860年即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烧毁圆明园，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最终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对列强作出巨大让步这一重大事变），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毗裂。每与酒酣耳热之下，闻可以安内攘外者，感触于怀，随笔札记。”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废除缠足问题上，郑观应的

逻辑清楚而简单：中国遭庚申之变的奇耻大辱是因为国家太过衰弱，而国家太衰弱是因为国家的男人女人太柔弱，男人女人太柔弱是因为先天“两仪不完”所造成，而“两仪不完”就是因为妇女裹足所造成的男女阴阳两极不和协，不调洽。也就是说男女阴阳不调洽是导致“万事隳矣”的根本原因，而万恶的缠足正是导致了男女阴阳不调洽的罪魁祸首。以中国

传统文化的逻辑，郑观应告诉了世人，国家要达到强盛免受欺凌，必须要彻底废除“无益于民生”的恶行——缠足。

除了从“无益于民生，有关于世教”的角度阐述废除缠足的重要性之外，郑观应还从基本的人性角度，人道主义出发阐述废除缠足的必要性。“夫父母之爱子也无所不知，而钟爱女子尤甚于男儿，独此事（缠足）酷虐残忍，殆无人理：或四五岁，或七八岁，（父母或其他长辈）严词厉色，陵逼百端，必使（女孩）骨断筋摧……人生不幸作女子身，更不幸而为中国之女子，戕贼肢体，迫束筋骸，血肉淋漓，如膺大戮，如负重疾，如覩沈灾。”[2]在郑观应看来，缠足是残忍的无人性的行为，是对女人从儿童开始就进行的严重摧残和迫害，是戕害妇女身心，“为合地球五大洲之所无”的“极弊之政”，务必要通过改革，最终“一律禁止”。[3]

从国家能否“安内攘外”不受欺凌的“国家主义”角度，女人能否不被迫摧筋断骨、戕害身体的人道主义角度，郑观应都发出了强烈的废除缠足的呼吁，而且针对性地提出了循序渐进的改良方法。其方法主要是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采取“禁不过急，持之以恒”的办法，通过“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让“有转移风化之责者重申禁令（即禁止裹足），……违者罪其家长，富贵者停给诰封”[4]的两手策略，移风易俗，使全社会永除裹足的陋习。

郑观应说其废除缠足的议论（“所以言之喋喋者”）“实有系于天下苍生，非仅考订源流而已”。他注意到八旗入关之后，顺治帝、康熙帝都颁旨禁缠足，但都不了了之。究其因，郑观应认为是“立法太严、牵连无辜，以为无关紧要，事竟终

止！”所以在废除缠足的改良建议里，可以看到郑观应主张采取渐消积习的办法，从上而下逐渐根除而不是因为过激、过急反而无法执行，最后无功而返。即：“凡属贵臣望族以及师礼大家，俱遵王制；其倡、优、隶、卒、及目不识丁之小户，听其自便。如此之法行之十年，则积习渐消，天下万民皆行古之道也”（即不裹足之天然行为）。[5]

在当时看来，缠足对中国女性身心的严重摧残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郑观应反缠足的呼声与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改革派的改革措施一样为中国妇女摆脱桎梏走向解放做出了贡献。

女学最强者其国最强

郑观应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时代，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当时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重要问题是考虑如何不灭国灭种。郑观应思考的出发点是国家如何摆脱衰弱不振的局面，走上富强的道路。在同西方世界的对比中，郑观应感觉到了女学发达与国家强盛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看，郑观应看到了作为自变量的女学发达程度与作为因变量的国家强盛程度的强烈相关性。女学越发达，国家越发达，女性教育的“盛”或“不盛”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强与不强。“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盛，英、法、德、日本是也。”[6]郑观应将女学提到关乎国家之兴衰存亡的高度。“女学衰，母教失，愚民多、而智民少，如是国之所存者幸矣。”[7]

据此，郑观应详细论证了中国的强盛与兴女学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是故中国而不欲富强则已，如欲富强，必须广育人才。如广育人才，必自蒙养始；蒙养之

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学校始。推女学之源，国家之兴衰存亡系焉。何则？襁褓之婴、孩提之童，亲母之日多，亲父之日少；亲母之性多，亲父之性少。由六七岁有知识，以迄十二三岁，天性未漓，私欲未开，母教之如种花莳果，灌溉栽培，先养其根本。教子女亦然，凡衣服、饮食、嬉戏、步趋，皆母得而引导焉、指授焉、勉励焉、节制焉。故自有生以来，其对于母也如其久，如其切。使母之教而善，则其成立也易；母之教而不善，则其子之成立也难。孟母三迁厥居，以训其子，孟子遂成大贤。欧阳文忠公为一代文章大家，始其母以画荻教之。求之古人是其明证。”^[8]

郑观应的逻辑简单而铿锵有力，明白无误地论证了在家庭教育的环节中，母亲对子女成长的重要性。

从现代家庭社会学的理论来讲，郑观应的观点非常朴实但很有道理。今天人们普遍认识到家庭有着重要的教育功能。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第一场所，人初始的社会化出了问题，再要矫正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现代社会学已经认识到每一个人的社会化，不仅需要家庭的哺育，更需要家庭的教养。而教养离不开与儿童朝夕相处的母亲。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是在家庭中学会走路，学会说话，学会行为规范，学会生活自立的；在家庭中获得身体的发育，心理的发展，个性的形成，社会生活基本技能的掌握。家庭不仅为儿童提供了人生最初的游戏和学习场所，而且引导他们从游戏过渡到学习，再从学习过渡到劳动。在儿童从生物人走向社会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母亲的作用无与伦比。因为多数人的幼年时期与母亲朝夕相处，母亲对孩子耳濡目染的机会最长最多，影响当然也

就最大。郑观应正是基于此，提出母亲的素质影响孩童的未来的观点。母亲与孩童接触时间最长，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指导者，在母亲的指导下，孩童学习并熟悉社会规范，在不断的被纠正与遵从中，形成自觉遵守与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今天社会分工已经非常细，母亲和孩子所相处的时间有所下降，但并不影响母亲的根本作用，而郑观应生活的时代，社会分工简单，女人的主要工作就是相夫教子，同自己的孩子相处的时间更多，因此重要性更不言而喻。

毫无疑问，在大多数情况下，母亲是孩子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老师，在家庭教育中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而老师质量的高低影响到孩子的成长。郑观应从家庭教育中母亲作用的重要性推论到女学的重要性逻辑严谨合理：女童接受教育才能称为质量好的名媛，而结婚生子的名媛才更有可能成为贤母，而贤母才更有可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所谓“人生自孩提以至胜衣，大都瞻依慈母，跬步不离。次家有贤母，其子若女比多造就。然后日之贤母即当年之名媛”。^[9]“家有贤母，其子女比多造就”是一个事实，为了让这种事实更加普遍化从而使国家富强，就必须增加贤母的数量，而只有兴办女子参加的教育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在《盛世危言》“女教”篇中，郑观应就在中国如何开办女学提出了符合当时时代特色切容易操作的办法：“中国……女范虽肃，女学多疏。诚能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译以华文，乃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而女红、纺织、书、数各事继之。富者出资，贫者就学，由地方官吏命妇岁月稽查，奖其勤而惩其惰。美而贤

者，官吏妥为择配，以示褒嘉。至于女塾章程，必须参仿泰西，整齐严肃。庶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纺绣精妙，书算通明；复能相子佐夫，不致虚糜坐食。愚贱皆知礼义，教化具有本原。此文、武之所以化行俗美也。”

循序渐进的社会改良更不容易遭到反弹，如果太猛烈则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郑观应在当时就提出今天我们的社会所要求的男女平等的一系列“激进”措施，比如男女同校，男女一起竞争等，那么连妇女走上解放的第一步，参加接受学校教育的形式都会变得不可能。如果女校都不能兴建起来，妇女接受教育自然会成为空谈。所以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郑观应提出通过“增设女塾，因材施教”使中国更多妇女“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纺绣精妙，书算通明；复能相子佐夫，不致虚糜坐食”是很实际的设想。有了形式才能有实质，如果女学校都不能开设，女性教育当然无从谈起。

关于郑观应女性观水平高低的一点议论

围绕废缠足，兴女学等问题上的女性观是郑观应重要的社会改良思想，已有很多人论及。但在如何评价郑观应的这一思想的问题上，今日论者之评价似乎并不是太高，有论者认为郑观应的认识“尚处于感性阶段，理论水平不高，其性质仍未能超越封建女子教育观的范畴”。[11]其实就理论水平而言，撇开男女平等的视角，从女人与国家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郑观应的说法未必就不高。在给经元善的信里，郑观应对女性教育和国家强盛的关系有很透彻的论述，可以说即使在今天也

是句句在理并不为过的。“中国如欲富强，必须广育人才。如广育人才，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学校始。”[12]今天中国的很多社会促进项目，其理论基础也往往建立在妇女对社会的进步具有至关重要作用这一基调之上。

公元2009年是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知名公益品牌“春蕾计划”（针对失学女童而创立的资助失学女童的慈善公益活动）实施二十周年，该基金会所属儿基会秘书长宋立英对“春蕾计划”予以高度评价，她说“春蕾计划”“二十年来改变了近二百万女童的命运，提升了中国母亲的素质，对我国人口素质的提升有着深远意义。”其实，“春蕾计划”资助失学女童的理论依据和郑观应的兴女学观点基本上没有多大差异，都强调母亲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宋立英说：“如果说一个民族的未来在于孩子，那么母亲的素质则决定了孩子的未来。”这个说法与郑观应所讲的“女学衰，母教失，愚民多，智民少，如是国之所存者幸矣”说法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母亲的素质决定了孩子的素质，孩子的素质决定了国家、民族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郑观应的女性观理论水平不能说不高，因为在今天它仍然有生命力。

当然，郑观应并没有从妇女与男人一样拥有人的一切权利的角度来论述妇女接受教育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但既然要求传统势力接受男女在人权上是平等的思想在今天依然艰难，而切看起来短时间内还不能完成，现代社会尚且如此，那么在一百多年前郑观应所处的几乎完全是传统势力所统治的时代一下子就毕其功于一役更是不可能。郑观应从论证妇女对国

家对社会无比重要的角度提醒世人对妇女另眼相看正是在向传统社会的女性比男人低一等的观念做出的强有力的反驳，加深了整个社会对女性重要性的认识，正是如此，男女平等之说才能渐入人心，逐渐获得社会的共识，从而有利于女性社会权益和地位的提高。

总而言之，郑观应的女教思想实是紧扣时代的合时而作，郑观应的女性观具有时代的进步性，理论水平并不低。

注释：

[1]陈文联：“中国近代兴女学思想的历史考察”，湘潭大学学报2004.2。

[2]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G】，郑观应.《盛世危言》“女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288页。

[3]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G】，郑观应.《盛世危言》“女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288页。

[4]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G】，郑观应.《盛世危

言》“女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289页。

[5]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G】，郑观应.《盛世危言》“女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289页。

[6]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G】，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二“至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264页。

[7]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G】，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二“至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264页。

[8]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G】，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二“至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264页。

[9]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G】，郑观应.《盛世危言》“女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288页。

[10]陈文联.中国近代兴女学思想的历史考察【J】，湘潭大学学报2004.2。

[11]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G】，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二“至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264页。

[12]参见中国新闻网，“春蕾计划”公益实施二十周年改变二百万女童命运，<http://www.chinanews.com.cn>。

（作者单位：电子科大中山学院人文社科）

（上接第42页）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照抄无误”，而别人的说法却只有鲍姑井的大致方位，没有鲍姑井的具体地址。

虬龙古井仇巨川应该了解，一是他在世的时候就经常游览越秀山，二是那时三元宫已见虬龙古影。清代乾隆五十年（1785年），斗姥殿（即三元宫）再次重建，据重建碑文称，“殿后枕朝汉台、鲍姑祠”，“北极旧殿东厅，额颜‘虬影’，架木屑列，明窗方池曲槛，游人憩玩焉”，其中的“虬影”，肯定跟虬龙古井脱不了干系。仇巨川不愿用按语直接点出虬龙古井就是鲍姑井，说明他根本想不到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和古籍记载明显不在一处地方，古籍所谓在“越秀山左（越秀山东边）”和“越台西南”，其实指的是同一个方位，虬龙古井只能说在越秀山右（越秀山西边）。仇巨川不把两口井联系起来，和他具有不具有科学态度

沾不上边边。后人为什么敢于根据这两个说法来证明虬龙古井就是鲍姑井呢？原因简单，就是直接受到“越秀山”、“西南”和“犹存”的误导，这几个要素也确实与今虬龙古井所在位置一一对应；还有个原因可能跟什么《广东省广州市粤秀山三元宫历史大略记》有关，羊城晚报的报料人就是把这个作为证据之一。经查，《粤秀山三元宫历史大略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东西。

鲍姑井真实位置在哪里，文献已有提示，只要搜索到越王台的位置，不难推测出其大概的地理方位。然而若想知道鲍姑井的确切地址，考古发现恐怕是最后的手段。

（作者单位：羊城晚报）